

出征戈壁滩

■张 晔

那个落雪的冬天，我踩着厚厚的积雪边走边欣赏大自然给这荒漠的馈赠。猛一抬头，见前面一个瘦弱的身影也在雪地里缓缓前行。细一看，竟是杨高工。

我入伍的第4年，参加了基地一个表彰大会——癌症患者攻克“导弹癌症”，杨选春荣立一等功事迹报告会。雄壮的乐声中，瘦弱的杨高工站在发言席上作报告，那是我第一次了解他与导弹的过往。

回过神来，我发现每走一会儿，杨高工都需要停下来歇息。他凝重的脸庞略带笑意，用双手接住空中飞舞的小精灵，像个孩子似的看着洁白的雪花在掌心里渐渐融化。

“多停留会儿该多好，其实沙漠里每个季节都有不一样的风景。”他对转瞬即逝的雪花发着感慨。

“杨高工，我一直很想采访您……”

“别，还是多鼓励年轻人，我已经病了那么久，组织给了我太多，我很感恩，很知足，不要再因我浪费时间。”

我只好说：“我想向您讨教×型号那天发射时突发故障是啥情况。”听完我的问题，他的表情由凝重转为轻松，耐心地向我讲解了关于地导的复杂问题……那天早上晨练碰到他，这唯一的对话竟成了诀别。

那个仲夏，戈壁滩一如既往，天空湛蓝，云朵洁白。一望无际的沙砾上，雷达高速运转，数辆装备车整齐地排列在电网之内，像整装的士兵等待出征命令。

狭小的装备车里，他忘记时间、忘记吃饭，满眼只有一堆堆数据，一摞摞稿纸，一张张电路图……感到自己不舒服时，也一直默默坚持。面对领导、战友的关切和问候，他只是淡淡地说一句：“没什么大碍。”随即又投入紧张的工作中去。随着一声巨响，一发导弹似利剑出鞘，在空中划过一道完美的弧线，刺向蔚蓝的天空。不久后，指挥所传来消息：“命中目标！”他如释重负，脸上露出灿烂的笑容。

当演习大功告成，他来不及跟大家一起庆祝，就不得不住进了医院。在医院里，他被确诊为胰腺胰岛细胞瘤。医生说，患这个病的概率是千万分之三，不仅罕见，而且治愈率极低。治疗期间，他先后做了两次大手术，缝合的伤疤长达20多厘米。长时间化疗，皮肤溃烂，头发几乎掉光，体重下降到40公斤。每天只能靠输液维持，生命的音符随时都会终止。但他强忍病痛，积极配合医生治疗，且在治疗的点滴间隙里继续着他的科研工作。每当从昏迷中醒来，他就着急地叫妻子郑华荣拿公文包来。妻子气得眼泪都掉下来了，“你都这样了，还想着你的导弹啊！”

有一次，他躺在床上输液，左手扎着静脉针，右手还在不停地计算。护士看到后，几次制止，他总是抬头一笑。

出院后，他依然不顾虚弱的身体跑到戈壁滩无人区查勘残骸，在颠簸的车上一坐就是几个小时。在某型导弹研制的关键阶段，当获悉部队要派人到上

海参与攻关，他考虑自己是该武器系统的专家，对该型导弹技术难题又做过长期的研究和思考，不顾大病初愈的身体，主动要求参加。

后来，在他的追思会上，来自上海的一位专家说：“当时我们与杨高工一起，他日日夜夜地工作，我们谁也不知道他竟然身患癌症做了那么大手术！”

在上海的三个月时间，他完全忘记了自己，不知疲倦地思考、揣摩。他同研究院同行一起探讨和交流，一起在实验室进行半实物仿真计算，一起下工厂查找武器系统故障原因，每天工作都在十几个小时以上。在研究院召开的一次权威专家研讨会上，他坚持做完了专题报告。关于该型导弹故障原因分析得到了与会专家一致认可和高度评价，并被厂方设计部门采纳，成功解决了长期困扰工业部门的镜像干扰问题。

2003年12月6日，该型导弹击落某靶机，试验验证了他研究报告的正确性。靶试的成功，不仅大大缩短了武器系统研制周期，而且为国家挽回了巨额经济损失。大家颇为感慨地称赞，是他这个癌症患者攻克了“导弹癌症”！

翻开他从军报国的历史，处处都留下了他瞄准打赢目标、攻克科技难关的身影……

这一天，因病情突然恶化，医院下达了病危通知书。

这一天，基地司令员再次来到他的病床前。他用颤抖的手拿出厚厚一摞稿纸，艰难地说：“这是上次试验中几个

问题的报告，也很可能是我最后的科技报告，请首长帮我带回部队，或许对科研试验任务会起到一点作用。”

司令员激动地说：“你不能再这么拼命了，我命令你停止所有工作，专心养病。”他却说：“我知道自己时间不多了，我要在生命结束之前，完成我的课题，争取再多计算一个数据，多解决一个问题，这是我最后的一个心愿。”

曾有多少次，大家劝他不要太拼，他都笑呵呵地说：“总感觉时间不够用，亏欠组织啊，我趁着身体还能扛，再多干一点。”一次，赶上某型靶弹出现“掉高”现象。他主动承担责任说，是我这个“控制”它的人还不够争气，我今天要与它一较高低！身边亲人朋友都劝他别犯傻，他却说：“我并不傻，那么复杂的试验数据我都算出来了，这点得失还算不清楚吗？我感到自豪的是，我选择的是我所爱的事业，舍弃的是个人私利，我无怨无悔。”

2018年9月3日，在弥留之际的他留下四句遗言：一、不开追悼会；二、遗体火化；三、骨灰撒到戈壁滩；四、捐献眼角膜。

女儿杨雪灿痛哭哀求：“爸爸，放一半到东风烈士陵园好吗？”他微弱的声音带着坚定说：“不，都撒到戈壁滩……”

2018年9月11日，上千名官兵整齐列队，向英雄致敬，为英雄送行。他的骨灰伴着阵阵秋风，伴着战友们深深的不舍，伴着他终生痴爱的导弹事业，缓缓撒向茫茫戈壁、弱水河畔、青山脚下……



每个人心中都有一个难忘的瞬间，一段闪亮的记忆，记录着“我和我的祖国，一刻也不能分割”的“叶对根”的深情。“我和我的祖国”征文启事刊出后，受到军内外广大读者的关注和支持。今天，“长征副刊”版再次推出“我和我的祖国”征文作品专版，以飨读者。

——编者

祖国赞歌

■高 帅

国庆前夕，昆明的大街小巷，雨后春笋般地悬挂起了庄严的五星红旗，放眼望去，火红的国旗迎风招展、鲜艳夺目，令人肃然起敬。春城街头这些飘扬的五星红旗，让我想起了几千里之外尼泊尔小女孩赛宾娜·拉玛画的那面五星红旗。虽然抗震救灾后回国已经4年多，但中国军人在异国他乡临危不惧、战天斗地、救死扶伤的场景依旧历历在目，我们在尼泊尔受到的种种礼遇更是难以忘怀。

4年前的仲春，一场8.1级的强烈地震骤然降临加德满都。顷刻间，大地震颤，山石迸溅，房屋倒塌，生命消逝。危难关头，我国紧急派出地震救援、医疗救助和防疫消毒等专业队伍到加德满都地震灾区。一场救死扶伤、抗击地震灾害的国际人道主义救援战斗就此打响！就是在这场惊心动魄的生命保卫战中，我们救援官兵与当时还是小学5年级学生的赛宾娜·拉玛不期而遇了。

地震中，赛宾娜的右前臂被砸断，头皮上一道严重撕裂伤裸露在外面。当时，主管医生周虎田告诉我，虽然赛宾娜的生命体征稳定，但头皮撕脱相当严重，如果不及时手术，就会因感染而危及生命。

5月6日13时30分，赛宾娜的手术开始了。如果一切顺利的话，只需进行头皮创口缝合。如果不能直接缝合，就要考虑皮肤移植。幸运的是，由于她头皮的韧性好，能够直接缝合。这不仅降低了手术难度，也有效规避了术后感染风险。

赛宾娜在中国医疗队治疗的那段时间，中国官兵无微不至的照顾给她留下了深刻印象。由于语言不通，很多时候，她只是静静地观察着这些身着迷彩服的“白衣天使”。

“这个红色方块是什么？”一天，借助翻译的帮助，赛宾娜指着护士张翌左臂上的红色臂章，好奇地问。

“这是我们国家的国旗，叫五星红旗……”护士张翌耐心地介绍着。得知那个红色方块是中国的国旗后，赛宾娜拿出纸和笔，在病床上认真地画了起来。由于右手受伤打着石膏，她就用左手握笔画了一幅五星红旗，并在下方写上“China Thanks”，郑重地送给了悉心照顾她的中国护士。

五星红旗代表中国，画一面国旗赠送恩人。赛宾娜用自己特殊的方式，向救治她的中国军人表达敬意，让大家倍感温暖。

这天，尼泊尔军方联络官心急火燎地跑来求援。原来，尼泊尔小伙子拉姆22岁的弟弟被埋在冈加普尔地区的一处废墟里。头天晚上，拉姆突然接到弟弟从废墟中打来的电话，但电话只持续了23秒，信号便中断了。为了救出弟弟，拉姆带着亲友发疯般地冲上废墟，可费尽九牛二虎之力，也没打开最表层的楼板。拉姆想到了求援。

得知情况，救援队队长陈代荣二话

没说，带领官兵迅速赶到现场。眼前的景象让他倒吸一口凉气：拉玛家这栋楼房共8层，坍塌成一堆高10米左右的废墟，难怪之前的救援队会望洋兴叹，救援难度实在太大了！但陈代荣还是毫不犹豫地下达了命令。大家从废墟顶部展开生死营救，24名官兵分成3组轮班进行。在接连破拆5个楼板后，终于搜索到了拉玛的弟弟。遗憾的是他已经没有了生命体征，但手里还紧紧握着已经耗尽电量的手机。

当时，从救援开始到抬出遗体，官兵连续奋战了近23个小时。23个小时与23秒种，也许这仅仅是数字的巧合，但中国军人不抛弃、不放弃的救援行动，给现场围观群众留下了深刻印象。

在乔塔拉镇，正在展开防疫消毒作业的下乡梅驹中暑晕倒，苏醒后又继续投入工作。看到年轻战士如此拼命，当地一位50岁的村民库玛丽大妈，满含深情地拉住小梅的手说：“谢谢你们！谢谢你们！”

置身国外，每名官兵从未那么深刻感受到自己和祖国如此紧紧相连。我们伟大的祖国把和平、友谊的种子播撒到了世界各地，我们这些走出国门的官兵，就像一个幸运儿，尽情品尝到了果实的甘甜和香醇。

看着街头飘扬的五星红旗，我不由得又想起官兵救灾时最爱唱的那首歌：我和我的祖国一刻也不能分割，无论我走到哪里都流出一首赞歌……

作，哪怕是到炊事班喂猪都行。连长斩钉截铁地说：“没门。”

一天晚上，团部在露天广场上放电影，当看到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，罗布泊上空升起蘑菇云的纪录片时，我特别震撼。后来得知，就是我们老部队为原子弹筑的“窝”。这时，我心头的疙瘩解开了，并重新认识了自己，我决心像老兵那样去战斗：干惊天动地的事，做隐姓埋名的人！

期间，我们克服了常人难以想象的困难，出色地完成了各项战备施工任务。虽不能时时穿军装，可身体里始终流淌着军人的血液。我终于懂了，军人不在于穿什么衣服，守什么岗位，而在于不能牺牲奉献，听党指挥跟党走。从此，我把这身工作服当成挚爱的军装，把手中的大锤、铁锹当作神圣的钢枪，全身心地投入到施工中去。

1982年大裁军，基建工程兵被撤销，部分人转入武警部队，其余官兵一律转业退伍。脱下工作服的那一刻，我们都泪流满面……

想当年，我们为祖国的“两弹一星”和国防特种工程建设做出过不朽的贡献。作为军人，能到这支英雄的部队、神秘的部队服役，我感到荣耀和自豪。

一晃几十年过去了，尽管老部队已不复存在，我们大部分人都年过花甲，有的与共和国同岁，有的到了耄耋之年，但我们仍怀念部队，想念军营，想念战友。我经常把过去的工作服拿出来看一看，放在手中掂量掂量。跨越时空隧道，回味那段激情燃烧的岁月，我依然为当年的自己感到骄傲，在那个特殊的岗位上，我曾是一名不穿军装的“特种兵”，为祖国的国防事业，奉献了最美的青春年华。

难忘的烙印

■尹令名

今年春节回家探亲，一进村庄我就被眼前的景象震撼了。家家户户都是二层、三层小洋楼，村头的稻场上停着一排排小汽车。村里的大娘、老嫂子们正跳着广场舞。男女老少手里拿着手机，玩微信、微博、抖音，谈论着家家户户的新变化和新农村建设发展的新成就，脸上洋溢着幸福和满足。

晚上，我和乡亲们围坐在一起叙旧畅谈新中国成立70年来的辉煌成就。

我的家乡是大别山革命老区的一个边远小山村。新中国成立前，村里不通水、不通电、不通路，属于“交通靠走、通信靠吼、治安靠闹”的闭塞山区。

上世纪70年代初，记得一次，我和几个小伙伴在村头玩耍，突然一阵歌声传进耳朵里。当时，大家根本不知道这声音从何而来，是什么声音，一个劲儿地往发声的方向跑，来到村里会计家。院子里早已挤满了乡亲，大家围着一台红灯牌收音机，静静地听着，脸上满是惊奇和兴奋。村里张大爷好奇地问：“这么一个木盒子，又没嘴巴，怎么会唱戏说话？”

这是我人生中第一次看到收音机，听到广播声。后来，大人们在村头的皂角树上挂上了大喇叭，每天一大早就开始放广播。从此山村的宁静被打破了，乡亲们农闲时，就是吃饭也要端着饭碗集中在树下听新闻、听革命歌曲、听样板戏。我们小孩子最爱听的是“小喇叭现在开始广播了！”记得1976年9月9日伟大领袖毛主席逝世，全体乡亲就在大喇叭下一遍一遍地听哀乐，人们心情非常悲痛，每个人的双眼眼里噙满泪水，不少人呜呜痛哭。

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，农村实行了土地联产承包责任制。农民的温饱问题逐步解决，少数青年人走出村子到武汉等大城市打工，乡亲们也慢慢地走向了富裕。记得上世纪80年代初，有一个青年在武汉打工，结婚时买了一部黑白电视机带回村子，这下可是出尽风头。屋里屋外挤满了人，都想

看看电视机是啥样。

那时村里还没有通电，有人专门赶了几十里山路借来了小发电机，用村子里加工米面的柴油机发电。终于有了电了，大家打开电视机，屏幕上全是麻麻的雪花点，不要说图像，连声音都没有。大人们又装上室内天线，一个人拿着天线爬到树上，举着天线杆摇来摇去的，电视机里终于有了断断续续的声音，但还是没有图像。有人说：“山岗地势高，到山岗上去试试！”于是大家又把电线和电视机搬到山岗上。这次一试，电视机屏幕上终于有了黑影在闪动。所有人的眼睛都目不转睛地盯着闪动的影子，边看边聊。几年后，家乡通电了，用上了电灯，村里买了几部电视机，电视信号也好了，人们夜晚的生活日渐丰富起来。看新闻联播、看文艺节目、看电视连续剧《霍元甲》《陈真》《射雕英雄传》等等。每次吃完饭，大家把椅子摆得整整齐齐，往往看到深夜电视屏上有了“再见”字样，人们才散去休息。

上世纪90年代，我光荣参军入伍，那时和母亲联系的唯一方式只有写信。有一年，我哥哥买了一部“大哥大”，拿到村子里想让母亲和我通上一次电话，但村子周围都没有信号，哥哥带着母亲爬了几里山路，才找到一个有信号的地方。我听到母亲不断地喊“令仔”的声音，母亲也听到我喊“妈妈”的声音，都特别兴奋，仿佛所有的思念都寄托在这部“大哥大”上。母亲回到村里后，见人就讲：“那可真是个好东西，我也要买一个。”村里人告诉她：“那个东西很贵，要上万元，把房子卖了也买不起。”后来通信技术发展了，村民们也富裕了，村子里家家都有了手机。我和母亲不仅能随时通话，还经常可以视频聊天。

收音机、电视机、手机，折射的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时代进步的烙印和中国社会前进的步伐。5G时代即将到来，我深信，5G会给我的家乡、我们的生活带来更大的变化。



飞天壮歌(油画)

孔 平 作

特殊的战位

■熊自洲

40多年前，我毅然放下教鞭，响应祖国号召，报名参军入伍。经过体检、政审合格后，我如愿以偿地穿上了令人羡慕的绿军装，圆了我的军营梦。

报名、体检那会儿，听说招的是特种兵，所以政审时特别严格。那一年，部队在我们县招了100多人。当时，我们不知道去哪里，也不知道部队在何方，更不知道是哪个类别的特种兵。后来，到了部队才知道我们属基建工程兵，因执行特殊的国防施工任务，征兵时对外统称“特种兵”。

第一次离家出远门，我心里既激动又兴奋。记得入伍的那一天，我穿上崭新的军装，胸前戴着大红花，村里敲锣打鼓地把我 and 另一名新兵送到了镇上。公社领导为我们召开了欢送会，晚上还放了一场露天电影。

第二天清晨，我们向部队出发了。汽车在国道上颠簸，一路向北，我以为是要去昌黎列车到北京。谁知到了武汉兵站后，吃罢早饭又乘车到了汉口的一座码头，登上了东方红46号客轮逆流而上。豪华的大客轮劈波斩浪，勇往直前。洁白的海鸥盘旋在轮船的上空，时而俯冲，时而低飞，时而腾空而起，在空中滑翔、旋转，跳起欢快的舞蹈，发出犹如天籁般的叫声，就好像在欢送我们远

行。经过四天三夜的航行，轮船到达重庆，我们再乘车抵达新兵团训练基地。

所谓训练基地，其实就是部队借用地方的一个粮站，以连为单位，每个连住在一栋仓库里。大家睡的是地铺，班排之间有一米宽的走道。训练我们这些新兵的是接兵的高班长，他个子不高，目光坚毅，穿一身得体的军装，显得格外精神。训练时，高班长对我们要求非常严格。刚开始，我真的不适应，也很想家，想念父母和亲人。但随着时间的推移，我却像着了魔了一般爱上了军营。在新兵连里，我学会了军事本领，明白了纪律的重要性，懂得了军人就是要吃苦的道理。

紧张的三个月军训结束后，我戴上了帽徽、领章，被分配到工兵连。下连时，我特意照了一张军装照，寄给了远在千里之外的父母。他们看了照片后回信说，我长帅了，成熟了。

老连队驻扎在半山腰一个叫回头湾的地方。那里群山环抱，山峰如林，光秃秃的大山看不见一棵树，石头缝里杂草丛生。营房是用乱石垒起来的，屋顶盖的是油毡。营房背靠青山，分上、中、下三排平房，排与排之间隔着十几层台阶。机二连住在隔壁，山下是村庄和梯田，团部卫生队和加修连驻扎在山下的山包上。大家都很纳闷，这是什么部

队？连围墙都没有，怎么看都不像军营。

到了连队，我下到二排四班和连部同住在中队第二排房子里。一排单独住在上面，二排、四排和炊事班分别住在最上面的操场旁。操场不大，平时训练和早操只能在连队后面一条简易的碎石路上进行。

下连的第一课就是保密教育。人人要签订保密卡，奉行“上不告父母，下不告妻儿”的保密规定。经过三天的政治教育，熟悉各自的战位后，我们脱下军装，穿上工作服，戴上安全帽，手拿铁锹、肩扛风钻，在操场上集合列队，然后到坑道里施工。

根据部队规定，所有参与施工的官兵统一着工作服，不戴帽徽、领章。我清楚地记得，那时每个班都有包裹房，室内堆放各种施工工具，墙上则整齐地挂满衣服，不是军装就是工作服。连队每年除正常发军装外，每个季度还要发工作服。春秋季节工作服为深蓝色劳动布，仅次于现在的牛仔布。夏季为白色和军绿色纯棉衬衣，下身配的确良军裤。冬季为军用棉袄棉裤，穿上很舒服，透气、吸汗，干起活来方便。刚开始，我想不通，有抵触情绪。当兵的不扛钢枪却拿铁锹，就连军装都不能穿，换了谁心里都会有想法。施工一段时间后，由于劳动强度大，加之身体单薄，我吃不消，就向连里打报告，要求调换工



长 征

第4664期